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美]施特劳斯◎等著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通信集

Return to Classic Political Philosophy

朱雁冰 何鸿藻◎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通信集

Return to Classic Political Philosophy

[美]施特劳斯 | 等著

[德]迈尔 | 编

朱雁冰 何鸿藻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美)施特劳斯等著;朱雁冰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8

ISBN 7-5080-3934-3

I. 回… II. ①施… ②朱… ③王… III. 政治哲学—文集
IV. 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3708 号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örige Schriften-Briefe. 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published by J. 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200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6100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

[美]施特劳斯 等著

朱雁冰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6.75

字 数:377 千字

定 价: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聋聒聒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谨将此译文献给
我们亲爱的女儿念鸣

——译者

中译编者说明

大思想家的书简，向来是宝贵的思想史财富——坊间已有的康德书简、黑格尔书简、荷尔德林书简，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哲人书简对我们可能更有吸引力，原因很简单：这些书简由之产生的历史处境与我们的切身处境更贴近——尤其德国的思想家，因为，相比之下，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磨难，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复杂、深剧得多，而德国人偏偏又是忒好思考的民族。我们有理由推想，比如说海德格尔的书简（尤其与布洛克曼女士的书简和晚近刊布的海德格尔给他夫人的信：Gertrud Heidegger 编，*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ed*，1915~1970，München 2005，416 页）、施米特的书简，读来一定很过瘾。

施特劳斯出身和生长在德国，但在年轻时，他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我不是德国人，而是犹太人”——施特劳斯思想所立足的土地在哪里？施米特可能会说：我首先是个天主教徒，其次才是个德国人；海德格尔则八成会说：我首先是个德国人……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无疑给西方思想带来过一场历史含义深远的转变——尼采是这场转变的伟大先驱。这场转变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要求严肃认真的思想者必须通盘重新审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的动力机制。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审视、以什么方式审视、朝着哪个方向去审视？

施特劳斯一代学人最为切近地置身于这场大转变的起始时刻，并严肃、热切地投身于这场新的审视——无独有偶，这代人所经历的现实生活的磨难也至为艰辛。几十年后，施特劳斯以自己比其他同伴更为丰硕的成就表明，他的审视最为深广、透彻，直逼西方思想大传统最为内在的脉动。如今，业内人士公认，施特劳斯的书简是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

有的思想者的思想能让人享受到智性的快乐,却不会让人感动——读施特劳斯的书简,不仅令人感动,还让人感领到浩淼深幽的历史沧桑。

迄今已经刊布的施特劳斯书简有:1. 迈尔(Heinrich Meier)编辑、整理的现存可以找到的所有施特劳斯与克吕格、洛维特、克莱因和索勒姆四人的通信(见《施特劳斯文集》卷三);2.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通信(中译见施特劳斯,《论僭政》,何地译,北京:华夏版2006);3.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中译见施特劳斯/沃格林,《信仰与政治哲学》,谢华育、张新樟等译,上海:华东师大版2006);4.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的三封通信。没有整理出来的重要书信还有与阿拉伯古典学家、施特劳斯的妹夫克劳斯的通信和施特劳斯与自己的学生伯纳德特的通信(这两部分书简的整理,迄今还遥遥无期)。

这部施特劳斯通信集以迈尔(Heinrich Meier)编辑、整理的部分为基础,加上与伽达默尔的通信,实际共5人,他们都是二十世纪有影响的思想家(克吕格、洛维特、克莱因和索勒姆四人的介绍,中译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版2003,页166~174)——这些通信仅现存可以找到的部分,因而显得相当残缺。

迈尔的编法是,将施特劳斯与每位朋友的通信编在一起。如此编法固然凸显了施特劳斯与各位同伴的思想和人事交往,却割裂了书简给人带来的施特劳斯思想的历史感。我们重新按每封信的时间顺序编排,使得这部书简集回归施特劳斯的生平史——信函编号按年代编序,有需要查索原文的读者,也不难在迈尔编原本书中找到。这些与不同层次的朋友们的书简交织起来看更有意思,好些事情也更连贯和有整体感,比如,施特劳斯给洛维特回信时,夸奖了洛维特的文章,同时却在给克莱因的信中说,给了洛维特的文章“毁灭性的批评”云云。我们有理由期待,不久的将来,有关人士还会找到和刊布施特劳斯的一些书信,到时要补进这个编年体书信集就容易得多了。

感谢成官汎博士和田立年博士,他们在百忙中分别应约翻译了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的通信和伽达默尔接受的访谈。

私人信件的语言不像发表的论著那么规范,何况哲人之间谈的经常是些含义艰深、涉猎广泛的哲学问题。不消说,整理这些书信非常辛苦(原件多为手写,而非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施特劳斯的手迹连老朋友也感到头痛),为此,迈尔教授和他夫人耗费了长时期的辛劳(迈尔曾给笔者看过施特劳斯致伯纳德特信的原件,笔者当然两眼一摸黑)。可以想见,翻译这样的文字要比译通常的专著吃力得多。深切感谢朱雁冰、何鸿藻两位老人,在自己人生的艰难时日译出施特劳斯与四位友人的书简,让我们比不识德文的英、美、法学者们先读到这份宝贵文献(德文书简部分大多迄今没有英译)。

施特劳斯究竟要干什么?学界好些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自己迄今还在琢磨欧美学界好些学人也在问的这个问题。今年五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一个关于施特劳斯的国际研讨会,迈尔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题目就是:“为何是施特劳斯?”经迈尔同意,我们将这篇讲稿译出,作为这部迈尔编辑、整理的施特劳斯书信集的“代序”。

刘小枫

2005年10月

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为何是施特劳斯？

迈尔(Heinrich Meier) 卢白羽 译

出于哲学、生存以及政治方面的充足理由，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施特劳斯。早在施特劳斯之星升上大西洋两岸的中天之前，这些理由就存在了；人们对施特劳斯的兴趣使得他名噪一时，然而，就算这兴趣最后会消退，论争施特劳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烟消云散，这些理由仍然会继续存在。我不会在这里来深入讨论那场关于施特劳斯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论争，而是要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列奥·施特劳斯？这与当下的施特劳斯热毫无关系。我还会谈及施特劳斯哲学学派的建立，没有这一学派的建立，就没有当今关于施特劳斯的论争。

施特劳斯 1899 年生于德国的基希海因(Kirchhain)，1973 年卒于美国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很长时间以来，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一直不为人所知。也许，这样问更合适一些：施特劳斯与众不同之处究竟何在？他在哲学史上赢得特殊地位凭的是什​​么？他究竟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在他身上究竟有些什​​么在别人身上很难找到的东西？我将自己的回答分成如下四个。

回答一：施特劳斯开辟了一条通向哲学史的新通道，这条通道既是历史的，又是一条截然不同的哲学的通道。

长期以来，最为频繁地与施特劳斯这一名字联系起来的，是所谓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技艺。两千多年来，哲人用这种方式给他们作品的读者讲不同的东西，给不同的读者不同的东西去思考。施特劳斯重新展示这一方式，对理解哲学史有着颠覆性和根基性的意义。过去的哲人都是在审查和迫害的环境下写作的，这当然并非哲人利用隐微-显白之分的唯一原因，但若想从历史角度合理地阐释一部作品，就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施特劳斯的发现使我们重新意识到

上述事实，而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明显遗忘了这一事实。因此，要想适当了解哲学传统，就必须深入研究、悉心熟悉那“已被遗忘的写作技艺”。施特劳斯在其作品中使得这种写作技艺发扬光大，重获新生。

施特劳斯的这一重新发现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已经不容历史研究忽视，由此产生的哲学成果也相当可观。过去的哲人写作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读者，他们精心区别这些读者，既对同时代人的大多数人说话——至少从未无视这批听众，同时又针对少数能承受哲学的人而写作（从面是为未来的哲人面写作），既然如此，我们就当能理解，作家在展示自己的学说时，必得顾及其同时代人的见解和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的信仰立场，以便那些懂得去理解的少数人能从书中读出某种东西，这东西把哲人与同时代人的见解和共同体的信仰立场区分开来，从而让少数人理解到，哲人让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了彻底的批判。

对于解读这些书的人来说，接下来就要以细心的阅读来回答这种谨慎写作的艺术。解读者若要想得到作家就他所探讨的事情的真实想法，就必须参与到这个作家的整个思想活动中去——隐微-显白的展示正是以此思想活动为基础的，以便自己去思考那些成问题的事情，除此别无它途。换句话说，解读者必须从手头的作品出发去追问作者的意图。就修辞细节来看，这些作品犹如天衣无缝的整体，每个细枝末节都要求解读者十二分的留意。解读者还要竭力与热爱智慧的积极活动（philosophische Aktivität）合拍。这些积极活动在作品中虽有所体现，毕竟没有凸显出来，也没有与之融为一体。对解读者的这些要求，最终通向施特劳斯著名的解经学原则：要像一个哲人理解他自己一样去理解他。

我不妨概括列举经由施特劳斯开启的通道所结出的三个哲学成果。第一个成果涉及到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断言，所有思想本质上都有历史关联。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采用“历史关联式”的写作和言辞，这种写作和言辞顾及同时代的期望、见解、判断。如果在以隐微-显白方式展示出来的具有两面性的学说与哲人的思想有

关键差异的话,那么,从这种“历史关联式”的写作和言辞之中就不能推断出,作者的思考也由那些期望、见解和判断所决定。因此,哲学要依赖于历史这一点,并非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毋宁说,这历史的依赖性恰是哲学地辨析哲学史时的研究对象。

其次,在历史地重构哲学的教义时,这样的哲学史辨析不会半途而废,因为,这些教义已经进入、而且能够进入到哲学史的教科书中去。哲学史辨析要将(过去的哲学中的)教义式内容与热爱智慧的积极活动区分开来,进而从根本上反思学说与思想、作品与哲学生存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哲学史辨析能更彻底有力地抵制哲学在哲学教义和体系的历史中变得僵化——“解构传统”就曾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史辨析,它压下传统中对问题的回答,剥茧抽丝般地寻出传统中隐藏着的、被遗忘的甚至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为思考之故重新捕获这些问题。这里只能概略言之的如此哲学史辨析始于早期海德格尔的探索,施特劳斯接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脉动继续推进,使之推展到这样的地步:哲学史研究不再是把哲人们撇在一边的各种哲学史文献(geschichtliche Beiträge)研究,转向了把哲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天性能力的共性(Gemeinsamkeit der natürlichen Vermögen),转向了与此共性浑然一体的那一要事(Eine Sache)。

从历史到天性(Natur)的转向,对应于在解释层面上从复述整个作品转向整个儿探究作者的意图,这就是第三个成果。倘若成功,这就是一种理解,它深深植根于意气相投的相遇。这相遇允许分享经验,共有那些与热爱智慧的积极活动内在地联系起来的東西,这相遇就是施特劳斯为其解经学的坦诚(hermeneutische Offenheit)定下的最后一个前提:理解一位哲人,就要像他过去和现在理解自己那样,相遇是这一努力的前提;在这道路上,我们能学到至关重要的东西,相遇也是这一期望的前提。

回答二:施特劳斯使我们注意到,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我所说,施特劳斯开启了道向哲学史的道路:先是将哲学的教义层面与之前的热爱智慧的积极活动区别开来,然后通过迫切追问哲人的意图,打破传统的僵化,最后达到共同的洞见和经验,这

些洞见和经验在对话中超越了所有的历史沟壑、学说间相异的素质，联结了哲学的性情——所有这些的出发点都在于，哲学既非一种体系，也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植根于无所顾忌地提问，如此提问和探究不会因为任何回答而终止，所有的回答都不当信从权威。这样，哲学就获得了其内在的整一。在那个时代，唯有施特劳斯指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便在此前，也很少有哲人如此指出过——，针对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在论据和性质方面提出特殊的标准。勾勒哲学生活的轮廓，必须考虑到历史境况。在历史的境况中，哲学得冒一定的风险，避而不答针对其权利和必要性以及“为何哲学”而提出的问题。

回答三：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置于哲学的中心。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把哲学视为对正确的追问及其回答；哲人认为哲学生活是正确的生活，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活。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基于有意识的选择，不为任何反对所动摇；在对人来说正确的和公义的问题上，哲学生活不仅与流行的回答对立，而且也与权威式的回答相对立。哲学生活遭遇到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要求，政治和道德责任因意欲贯彻自身而抵制哲学。这些政治责任和道德要求属于共同体的律法、神和人的信条及其戒律。（哲学）对正确的追问因此属于政治的领域。哲学不仅表明了政治事物的等级，哲学本身也被称为辨析政治事物的迫切性。

政治哲学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共同体的基础、其成员的责任和权利、成员行为的目的及方式、共同体内部以及与其它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就其内容而言，虽然政治哲学仅为哲学之一部分，其研究对象却绝非人类生活现实的局部狭小片断。政治哲学也绝不只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生活区域，由许多独立且等级相同的生活区域或“文化领域”来支撑。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要追问最好的政治制度、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威信、知识和权力的必要影响。要摆正这些问题，就必须与下列问题联系起来看：人的天性、人在神与兽之间的位置、人类精神及灵魂的能力，以及人的身体的欲求。

因此,政治哲学的对象是广义上的人类事物。

政治哲学以严肃审慎的态度辨析正确(Richtigen)的问题,这种态度正是政治领域所亟需的。因此之故,政治哲学成了哲学的反思之所。政治哲学包括思索政治哲学生存的政治条件、确证哲学的自然根基,以及看清哲学的权利和天性与共同体的需求之间没法清解的张力,进而还包括思索适宜的修辞,用以恰当地处理这一张力。政治哲学肩负着替哲学进行政治辩护的任务,而哲学的理性(rational)证明也只会在此。正因为事关哲学整体,政治哲学才证实自己为哲学的一部分。

回答四:施特劳斯是第一位将神学-哲学问题列为其主题的哲人。

哲学生活的理性证明,既不能靠理论规定或演绎得出,也不能靠体系化的努力来达成,这种努力的结局及成功还没有定数。若要给哲学的理性以充分的证明,就必须通过辩驳(elenktisch)来与强大的对手及其它上乘的选择论争一番。哲学必须在当下进行这一论争。这场论争才真正为哲学生活奠定了基础,因此,既不能推延、也不能推诿这一论争。

施特劳斯在1964年回顾自己的历程时,把神学-政治问题称为他研究的那个主题。他几乎就用了这么一些话说道:他的所有论著都围绕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他一直想给这种哲学寻找根据。在施特劳斯看来,谈论神学-哲学问题,几乎无异于就哲学生活与神学的和政治的选择进行论争的迫切性,或者说,哲学研究有必要考虑到各种(针对哲学的)意见和异议,因为这些意见和异议基于人的和超人类的权威来反对哲学。若哲学只能通过辩驳来为自己的权利和真理立据,就必须转向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许能够摧毁自身关于正确问题的回答。哲学必须懂得抵挡和反驳针对哲学的最强有力的异议,若哲学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其合理性,那么,这理性就得找出这个异议,并尽其所能使之强大——也只有哲学才能使之强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在其神学-政治论中致力于研究政治生活以及服从信仰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找出了启示(Offenbarung)这一挑战,并因哲学之故而使其强大。因为,对哲学生活的责难中,以对全能上帝的信仰及其戒律和律法为依据的责难最为强大。

这四个回答勾勒出(施特劳斯)对哲学所作出的贡献的基点。这一贡献使得我们这些少数人得以见到旧中的新、熟悉中的陌生、对立中的自身、肤浅中的深邃;在这一贡献为自我认知所开辟的空间中我们行得越远、越自由,我们就越是惊讶其激进。在我们之中或之后的那些重视哲学事务的人,很有必要去细细品味施特劳斯的作品和思想。

现在我来谈谈哲学学派的问题。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唯一的政治意图、唯一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就是创建一个学派,当芝加哥大学1949年聘请施特劳斯到政治系执教时,就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做出这一政治抉择时,施特劳斯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促使一位哲人去创建一个学派呢?所谓政治抉择又是在何种层面上来讲的呢?

就发展教学关联(Lehrzusammenhang)、跟踪一项研究计划、形成阐释的萌芽而言,学派都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学派会降低验证哲学论点及实验修辞手段的难度,可以将一座思想大厦析分出不同的流派,要追踪或完成对某些对象的阐释,单枪匹马恐怕难以胜任,而学派却使之成为可能。建立学派能够让人关注到哲学的新取向、并使之保持下去。若要为传统立据,以使后世更容易进入经典之中,学派也是选择的工具。对于那些今后在共同体中要承担一定责任的那些公民来说,学派尤其能够让他们熟悉哲学,教育他们对哲学抱有善意,或最起码心怀敬意,且在必要时保护和支持哲学。

施特劳斯利用了学派所具有的所有优势。依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榜样,施特劳斯也抓住机会,发掘自己的学生的政治才干,培养贤人。作为美国公民,施特劳斯忠于这个在他自己遭迫害时收容了他的国家。对允许他过哲学生活的那些自由民主党人,他表现出是他们的朋友。施特劳斯促动他的一批学生去研究美国的历史、宪法以及政治的根基,还鼓励他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施特劳斯尊

重他们的爱国心,教导他们要理解那与政治生活相宜的尊严。但施特劳斯也明确指出:“爱国心是不够的”,与雅典公民苏格拉底一样,他尽量使所有人明白,他认为政治生活并不是最好的生活。

创建一个哲学学派可以对共同体施以有益的影响,且不管这影响多么间接、在各方面多么断断续续,然而,这都还不能说明创建学派是一项政治抉择。这一学派包容了千差万别的秉性,由哲人和非哲人组成,两者按不同程度结合,以分工来合作,因此,适用于政治共同体与哲学之间的张力的那些中心任务,在这一学派与哲学的关系之中才能生效。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学派与共同体相关涉的方方面面,正是这些使得创建学派成为一项政治抉择。这一学派也认为,对不同的接收者要说不同的话,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传承学说。这一学派还要求政治行动,并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

若这个哲学学说的学派受到更大关注,学派还可以强化、概括哲学的教条式内涵,强调那些可被传授、能形成表达式以及不细究实事就可重复、应用和传播的所有东西。当然,倘若学派还想赢得政治影响,就得冒一定的风险,即让哲学去适应某一特定的政体,或与某种政体走得很近,在未来,或在对此一学说有真正兴趣的世界其它地方,哲学才能重新松动与政治体制的纽带,去掉这一学说的缺陷——与在某一特定时间地点占统治地位的秩序的联合,成是服务于某一意识形态。

要想富有成效地建立学派,教师的口传学说必须适合学生的领会能力。许多证据表明,教师将其最幽远的反思、最深邃的思虑、最具挑战性的思索都诉诸他精心写成的书中。然而,在学派中,口传总有更高的价值。通过口传,学生很容易试着把握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或是认为它们不可放弃。这就很能解释,为何这一学派很容易形成成为教师在哲学上的激进作辩护的趋势,而且为何恰恰在学派的圈子里,常常轻视教师的思想,各色虔信却大行其道。

和任何人一样,施特劳斯同样清楚学派的问题和哲学中的传统。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廊下学派及其追随者、最晚近的接班人,这些历史施特劳斯都一清二楚。1950年,